

译林留痕

——方梦之译学文集

方梦之 著

译林留痕

——方梦之译学文集

方梦之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译林留痕:方梦之译学文集/方梦之著.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4
ISBN 978-7-5446-3666-7

I. ①译… II. ①方… III. ①英语—翻译—文集 IV ①H315.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40217 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lep.com.cn> <http://www.slep.com>

责任编辑: 蔡一鸣

印 刷: 上海华业装璜印刷厂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张 33.25 字数 646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6-3666-7 / H · 1313

定 价: 58.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先行者 推动者 建设者

——方梦之教授对我国译学建设的贡献

郭建中

我与方梦之教授相识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至今近 30 载。他长我三岁,是我的兄长。我们之间的友谊,正如梦之兄在为拙作《科普与科幻翻译:理论与实践》写的序言中所说的:“其间,情谊随学术繁荣同增,理解与译学发展俱进。我们不断分享着理论探索的成果、翻译实践的心得和译协工作的经验。”

今年喜逢方梦之先生的杖朝之年。回眸我们“以文会友”的深情厚谊,想到他对我国译学建设的重大贡献,不禁感佩万千!方梦之教授是我国当代译学发展的先行者、推动者和建设者,是我们学习和追随的榜样!

中国历史上经历了三次翻译高潮,目前正在发展的第四次翻译高潮,“无论在规模上、范围上,还是在质量水平和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上,都是前三次高潮无法比拟的。”(罗进德,1998—2005)大量的翻译实践活动推动了翻译理论的研究,而翻译理论的发展又促进了翻译实践的提高。在我国每一次的翻译高潮中,都涌现了一批杰出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有的是两者兼之。方梦之教授就是我国这一次翻译高潮中显现出来的杰出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

方梦之教授的翻译思想、翻译实践和翻译活动,为我国译学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中国当代翻译史上留下了宝贵的一页。

科技翻译理论研究的先行者

方梦之先生通晓英、俄、德、日四种语言,早年在厂矿企业和翻译情报所从事了十多年的科技翻译实践,翻译了公开出版的科技著作 100 多万字(内部资料翻译不计)。大量的翻译实践,奠定了他日后从事翻译理论研究的坚实基础。

一般的翻译工作者往往沉湎于翻译实践,很少对自己从事的工作作理性的思考。方梦之先生却不同,他有很强的理论意识。在 1978 年底转入了教学工作之后,他就开始了理论研究。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任何一门课程都有它的理论基础,以实践为主的翻译课也不例外。”他认为,“理论对于实践经验的条理化、系统化有很大帮助。”因此,他如饥似渴地学习语言学知识和 20 世纪 80 年代初逐渐引进的

国外翻译理论。方老师调入高校从事英语教学工作不到一年,就开始撰写并陆续发表文章。80年代,在国内各外语期刊累计发表论文30篇,论题集中在语言对比、语言结构和科技英语翻译三个方面。

20世纪80年代,为适应我国改革开放的形势,大量的科技资料和著作需要引进,从而促进了科技翻译理论研究的兴旺。方梦之先生不仅是科技翻译理论研究的先行者,更在这一领域显露了非凡的研究才华。《文体研究与科技翻译》一文获1988年12月在西安举行的“中西部科技翻译研讨会”一等奖,《我国科技翻译理论研究十年的回顾与述评》在1991年4月于无锡召开的“第五次全国科技翻译研讨会”上再次荣膺榜首。这两篇宏文,显示了方梦之先生学术研究宽阔的视野,因为他不仅胸怀整个科技翻译研究历史的全局,更放眼当代科技翻译研究的发展趋势。而1989年付梓出版的《科技英语实用文体》,则可以說是他80年代科技翻译理论研究的扛鼎之作!他于1985年开始动笔,1987年完成初稿,1989年付梓出版,历时四载。该书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论述:从文体学的表达性来说明科技英语文体的特征,从文体学的功能性来分析几种常用科技文献品种的形式与语言结构;对科技翻译也有专章论述。王佐良先生高度评价该著作,认为该书“不仅内容井然有序,而且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在国内似尚无第二本。”杨自俭先生在《翻译新论·序言》中也说,该书是“10年(1983—1992年——作者)中在这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代表性著作之一”(杨自俭,1994)。该著作在科技翻译理论研究难以深入下去之际,以独特的学术视角,另辟蹊径,从文体学切入,成功地突破了当时科技翻译理论研究的瓶颈!

《科技英语实用文体》一书从文体学角度,界定了“专用科技文体”与“通俗科技文体”、“科技英语”与“科普英语”的概念,进而着重探讨了文摘、科技论文、标准和专利说明书等的科技英语的特征和翻译。而对科技翻译工作者直接有用的正是“专用科技文体”的翻译,因此可以说,《科技英语实用文体》的标题和内容,是真正的名副其实!能写出这样既有理论价值又有实用价值的著作,作者必须有翻译各类科技文体丰富的实践经验,同时又必须具有高度的理论修养。而具备这两方面条件的学者,当数方梦之先生莫属矣!正如作者自己所说的,《科技英语实用文体》的成书过程和教学的关系是:翻译实践→(理论指导下的)总结归纳→翻译教学;他还指出,科技翻译研究强调研究者的实践基础,忌讳空对空,这样的研究才能走得远。本书对科技英语文体特征的分析,对各类科技文献的形式与语言结构的总结,都有不少创新点,是作者对科技英语翻译理论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代表作之一。如果说《科技英语实用文体》主要是为科技翻译工作者编写的话,那么,2008年方梦之先生与范武邱教授合作,为“翻译专业本科生系列教材”编著的《科技翻译教程》,则是一本主要以大学生为对象的教材,而其理论基础还是《科技英语实用文体》所阐述的文体学与科技英语翻译的理论。2011年出版的《英语科技文体:范式

与翻译》，更有了新的突破。专著从篇章语言学的原理出发，以语篇分析和体裁分析为手段，对科技语篇的分析从描写推向解释；讨论文体和翻译时，注意吸收国内外最新的成果。可以说，此书是方梦之先生一生从事科技翻译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

方梦之先生对科技英语翻译理论研究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发表的有关专著和文章，涉及与科技翻译有关的语言学、对比语言学、逻辑学、词汇学、语法学、修辞学、心理学等诸多领域，此外，在科技英语翻译教学与教材编著、科技词典编纂和科技翻译家词典编纂、科技翻译史等方面，都有突出的贡献！

应用翻译理论研究的推动者

方梦之先生在教育翻译理论研究方面的贡献有两个方面。首先，他身体力行，以其丰富的著述为这一研究领域作出了杰出贡献；此外，他更是以《上海翻译》（原《上海科技翻译》）为依托，大力提倡应用翻译理论研究，培养了一大批应用翻译理论研究的人才，并联合其他高等院校和单位，多次召开应用翻译研讨会，掀起了全国应用翻译理论研究的高潮。应该说，这是方梦之先生对中国译学发展第二方面作出的重大贡献！

到了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更加深入，商务、旅游、新闻等行业领域迅速发展起来，与之有关的各类应用文体翻译也就逐渐发展起来了。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对外开放的大门进一步敞开，各类应用翻译有了较大发展，科技翻译已难以一统天下。有的学校也注意到了这种变化，加强了各类应用文体的翻译教学。在这种情况下，方梦之先生以其敏锐的学术眼光，积极投入和推动全国的应用翻译理论研究，以顺应时代的要求，适应翻译教学的需要。

1993年，方梦之先生首先推出了他主编的《译论纵横》，文集精选了《上海科技翻译》（现《上海翻译》）创刊7年以来论述各种应用文体翻译的优秀论文，其中包括钱伟长的《当代科学技术与翻译》等重要文章。接着，他推出了《英语汉译的实践与技巧》（1994）、《汉译英实践与技巧》（1996）、《翻译新论与实践》（1999）、《实用文本汉译英》（2003）、《英汉—汉英应用翻译教程》（2004）、《英汉翻译基础教程》（2005）、《英汉—汉英应用翻译综合教程》（2008）、《应用翻译研究：原理、策略与技巧》（2013）等一系列应用翻译理论研究的专著和教材，切切实实地“顺应了时代的要求，适应了翻译教学的需要”，有力地推动了全国应用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

在教育翻译理论研究中，方梦之先生继续以文体学的理论为依据，指出应用文本庞杂、类型繁多，可谓“体中有体，类中有类”，各种文体有着诸多的不同，同种文体的不同文本也差异较大，需要区别对待。适应一种次语域或文本的翻译方法或技巧不一定适应另一种次语域或文本，这就体现了文本类型与翻译方法的内在密

切关系。方梦之先生还提出了富有创见性的“宏观理论、中观理论和微观研究”的概念。他认为,应用翻译研究应包括六个基本范畴,其中宏观理论、中观理论和微观研究是一个开放式的理论体系,吸纳和整合各种应用翻译研究的理论于一体,并构成了应用翻译的本体研究。方先生尤其指出,翻译技巧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也随着相关学科的发展而发展,如传统的翻译技巧主要从语法的角度条理化、系统化,而现在学者则借助相关学科的原理,对翻译技巧加以科学的阐释。当然,需要指出的是,翻译技巧对翻译实践具有指导作用,但也不能评价过高。但同时,他又阐明了翻译实践和翻译经验对应应用翻译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他说:“应用翻译天生就和翻译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做应用翻译研究一定要有一定量的实践基础,我之前的大量科技情报翻译实践对我的科技翻译和应用翻译研究贡献很大。”

方先生撰写的上述一系列专著和教材,除了拥有缜密的理论论证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实用性!这是许多学者、读者、翻译老师和学生们的一致评价。他能够做到这一点,固然与他丰富的翻译实践经验有关,但更与他强烈的理论意识有关。在译学界,他是一贯主张翻译理论必须与翻译实践密切结合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

方梦之先生更大的贡献是创办《上海科技翻译》。1986年杂志开创之初他是执行副主编,1989年开始担任主编。时任中国译协常务副秘书长林煌天撰文祝贺《上海科技翻译》的诞生:“在我国科技翻译事业蓬勃兴起之际,《上海科技翻译》杂志应运而生,它适应时代的要求,适应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我们祝愿它在广大科技翻译人员的支持和爱护下成长起来,为繁荣科技翻译事业多做贡献。”(林煌天,1986)

随着应用翻译研究的发展,方梦之先生适时地把杂志改名为《上海翻译》,于2005年开始正式以新的刊名出版。方先生主持杂志主编工作28个春秋!如果从杂志创办开始算起,实际上有29个年头(1985—2013)。这是多么不容易啊!方先生为译学事业献身的精神,令人感佩万分!

这本翻译学术杂志,深受学者、翻译教师和学习翻译的大学生们们的欢迎!

这与方梦之先生所坚持的办刊思路和宗旨是分不开的。他坚持“人有我有,人无我有,人有我精,人精我无”,力求做到学术性、应用性、可读性兼备。改名为《上海翻译》后,期刊的宗旨又适时地作了微调,定为:“探讨翻译理论,传播译事知识;总结翻译经验,切磋方法技巧;广纳微言精理,侧重应用问题;把握学术方向,推动翻译事业。”期刊在这28年中所作出的成绩,译界有目共睹,有口皆碑!而其最大的特点,还是坚持了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的方针,不同层次的读者都能从中受益!

方先生以《上海科技翻译》和《上海翻译》为阵地,团结和培养了一大批科技翻译理论研究和应用翻译理论研究的人才,为我国科技翻译理论研究和应用翻译理论研究的的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方梦之先生长期担任上海市科技翻译学会的理事长职务,是一位杰出的社会

活动家。他以其主编的期刊为依托,热心参加和组织国内各种翻译学术会议;他善于联络各方学人,共商译学建设的大事。《上海翻译》编辑部,先后与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等联合召开过多次应用翻译研讨会和其他专题的翻译研讨会。由方先生参与组织的大型学术会议包括“首届上海经济区翻译学术研讨会”(1987)、“全国首届大中型企业翻译研讨会”(1992)、“99’上海翻译研讨会”(与香港翻译学会合办,1999)、第一届全国应用翻译研讨会(2003)。此后,他又分别参与主持2006年(广州)、2009年(北京)、2011年(上海)和2013年(西安)的第二至五届全国应用翻译研讨会。这些会议把全国的应用翻译和理论研究推向了新的高潮,为我国的译学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也必将在我国翻译史和翻译理论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译学辞典的建设者

译学建设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译学词典的编写。正如杨自俭教授所指出的,“一般说,一个学科发展到一定程度便会有本学科的专业术语词典出版,特别到了现代更是如此。”(杨自俭,2004)方梦之先生对译学建设第三方面的重要贡献,就是编纂译学辞典。

在编写《中国译学大辞典》之前,方梦之先生早就参与或主编了不少翻译类词典,包括《中国科技翻译家辞典》(执行主编,1991)、《新编科技英汉辞典》(副主编,1995)、《英汉高科技词典》(第一副主编,2001)和《译学辞典》(主编,2004),积累了辞典编纂的丰富经验。

方梦之先生的翻译理论研究,胸怀全国译学研究的全局,关注我国译学建设的进展,跟踪全国译学发展的趋势。为此,他发表了不少文章,努力推动我国的译学建设。这些文章包括:《发展和完善我国的译学系统》(《外语教学》,1988年第1期)、《思维科学与翻译学》(《福建外语》,1992年第1、2期合刊)、《译学研究的综合性原则——译学方法论思考之一》(《中国翻译》,1996年第4期)、《译论研究的系统及系统原则——译学方法论思考之二》(《中国翻译》,1997年第3期)、《略论译学术语的规范化》(《外国语言文学研究》,2001年第1期)、《术语建设与译学进展》(杨自俭主编,《译学新探》,2002年3月)、《追溯译学发展的轨迹——谈〈译学辞典〉的编撰思想和编撰实践》(《中国外语》,2006年第4期)、《从译学术语看翻译研究的走向》(《上海翻译》,2008年第4期)等重要文章。

方梦之先生辞典编纂的丰富经验和对我国译学建设的深入研究,奠定了他编写《中国译学大辞典》的坚实基础,而2004年出版的《译学辞典》可以说是《中国译学大辞典》的雏形。

在译学发展过程中,随着术语的增加,术语使用的混乱现象也在所难免,但对

译学的发展和建设来说,则是一个大问题。方梦之先生认识到,术语是某一特定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重要标志之一。术语的科学化、系统化、规范化水平往往代表一门学科的发展水平,因此不能忽视翻译学科的术语建设。

方先生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以学者的强烈责任感,穷年经月地搜集,追本溯源,积微成著,终成大业,在 2004 年推出了《译学辞典》! 杨自俭先生高度评价《译学辞典》,认为“(辞典)不但收入了很多西方现代译学的重要范畴与术语,而且收入了很多译学相关学科,如语言学、哲学、逻辑学、思维科学、心理学、美学、文化学、信息论、交际学等学科的范畴和术语。此外,在词条的选择上编者依据的是通用性和权威性原则,并做了很多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整理工作。在外来术语的翻译与术语的解释方面编者遵循的是单一性和科学性原则。上述几个方面既是这部辞典的突出特点,也是这部辞典对译学建设的重要贡献。”(杨自俭,2004)

随着翻译学科的不断发展和成熟,方梦之先生意识到世纪之初编纂的《译学辞典》已不能适应学科发展的形势和研究的需要,就萌生了编纂《中国译学大辞典》的构想。但他深知,虽然他基本上是单枪匹马完成了《译学辞典》的编写,但很难再以一己之力完成他构想中规模宏大的《中国译学大辞典》了。于是,他从港澳台和大陆各地盛邀各方专家学者组成编委会。好在“梦之兄不但学问做得好,做人也是大家的楷模。他淡泊名利,无私奉献,学术民主,善于联络各方学人,共商译学建设的大事。他学风端正,治学严谨,奖掖后学。所以他理所当然地成了译界的学术领袖人物之一。”(杨自俭,2004)方先生的号召,受到了国内外中国翻译学者的热烈响应。方先生以其非凡的亲和力和组织能力,组成了强大的《中国译学大辞典》编委会。在方梦之先生的领导下,编委会和国内外学者们以高度的使命感,专心一志,众志成城,终成煌煌大著!

方梦之先生不仅是《中国译学大辞典》编纂工作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更是以其“一体三环”的辞典编纂思想,使辞典内容丰富而有序——词条综合分类合理,做到了术语的科学化、系统化和条理化。在编纂《中国译学大辞典》前后,方先生把编撰理念、编撰原则、编辑方针、编辑方法等在编委会中详细阐述,统一编辑思想,并先后写了 10 余篇论文进行阐述。应该说,《中国译学大辞典》较好地体现了主编者的编纂思想,实现了主编者的构想。《中国译学大辞典》经过五年时间的筹备、征稿、编订、修改、整理、增补、校勘、印制,终于在 2011 年初面世。《中国译学大辞典》一方面再现了我国传统译论的发生和发展,另一方面也展示了我国当代学者的创新成果。《中国译学大辞典》在中国译学发展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并为推动中国译学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新的基础。因此,《中国译学大辞典》的学术价值评价再怎么高也不为过! 我们认为,《中国译学大辞典》的出版,标志了我国翻译学科已经完全建立起来了! 方梦之先生对我国译学建设的贡献,将彪炳译学史册!

方梦之先生的学术成就和学术活动,获得了译界一致的认可和赞扬。《中国译

学大辞典》(2011)问世当年,就荣获2009—2011年度上海图书奖一等奖。此外,他两次荣获中国翻译学会论文一等奖(1989、1991),1993年获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学术耕耘奖,1994年获首届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05年获得“资深翻译家”荣誉称号,2012年荣获中国译协“优秀社团工作者”称号,2013年获上海市科技翻译学会终身成就奖。

我们祝愿方梦之先生花甲重开,健康长寿,并为我国译学再铸辉煌!

参考文献

- [1] 方梦之. 我的翻译人生[J]. 现代外语研究, 2012, (8).
- [2] 林煌天. 为繁荣科技翻译事业多做贡献——祝《上海科技翻译》杂志创刊[J]. 上海科技翻译, 1986, (5).
- [3] 刘金龙. 应用翻译: 教学与研究——方梦之教授访谈录[J]. 山东外语教学, 2012, (2).
- [4] 吕锦忠. 从《土法炼铁》到《译学辞典》——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方梦之教授的学术之路[A]. 方梦之. 译林夕照[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 [5] 罗进德. 总序[A]. 翻译理论与实务丛书[C].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8—2005.
- [7] 穆雷. 业精于勤 功不在速——记科技翻译论坛上的方梦之教授[J]. 中国科技翻译, 1996, (1).
- [7] 上海市科技翻译学会网站·会员风采. 老骥伏枥辛勤耕耘的资深翻译家方梦之教授[A].
- [8] 杨自俭. 我国近期的翻译理论研究[A]. 杨自俭, 刘学云. 译学新论[A].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4.
- [9] 杨自俭. 我们应大力加强译学术语的研究——《译学辞典》序[A]. 译学辞典[Z].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

作者简介: 郭建中, 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曾任浙江省翻译工作者协会会长(现名誉会长)、中国译协理事、中国译协翻译教学与理论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前言

三年前,我将30年间断续在报刊上发表过的随笔、杂文、书评等数十篇学术散文选编成集,取名《译林夕照》,后又续编《译林回望》,均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作为学者,更看重学术成果,在友人们的鼓励和帮助下,现不揣粗陋,敝帚自珍,在望八之际编选这本《译林留痕》,完成了我的《译林三部曲》。文集从已发表的170多篇文章(见附录)中选出,反映我30余年来不同阶段的研究兴趣和学术成果。

20世纪80年代,我的研究还比较稚嫩,开始只是消费自己的学习经历和实践经验:从10余年的翻译经历中提取值得思考的问题加以探讨,把翻译经验归纳为翻译技巧。改革开放以技术贸易和技术转让为发轫,曾专事科技翻译的我躬逢其盛,一批有关科技语言和科技翻译的论文得以陆续问世。我研究科技翻译,主要切入点来自王佐良先生的文体学思想,从文体学的表达性来说明科技英语文体的特征,从文体学的功能性来分析几种常用科技文献品种的形式与语言结构。

因为技术情报工作的需要,学过几门外语,在学习和翻译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语言对比。所以对比语言学也是我初期的学术兴趣之一,发表过几篇不太像样的文章。

到了90年代,科技翻译研究一枝独秀的局面已打破,商务、法律、新闻、旅游等应用翻译研究纷纷兴起。从方法论上,经验式、点评式、感悟式的研究已显浮泛;单凭一己之长的研究易生偏颇。理论有助于实践经验的条理化、系统化。于是我的研究方向作了调整,即在一般理论指导下对应用翻译作整体研究,特别着眼于方法论和翻译方法策略的研究。

进入新世纪,国门大开,特别是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对外交流频繁,翻译实务剧增,文本形式多样,我国翻译市场开始发育,应用翻译的权重日增,促使应用翻译研究向纵深发展。2003年我策划和组织召开首届全国应用翻译研讨会,此后参与主持了2006年(广州)、2009年(北京)、2011年(上海)、2013年(西安)的第二至五届会议,旨在增进理论意识,加强应用翻译各个领域的实践研究,为已经建立起来的翻译专业,特别是翻译专业硕士(MTI)提供实践指向和理论支持,目标是建立应用翻译的理论体系。对此,我写了一系列文章。

研究译学术语和编撰译学辞典是我后期的主要学术方向之一。为了适应翻译学科发展的需要,充分反映我国翻译研究的成就,勾勒出中西译学的理论框架和传统脉络,特别要反映新世纪新发展,我开始收集译学术语,从起初零星的、断续的收集,积微成著,逐步形成明确的理念和整体构想:从译学形成中寻找术语生长的线索,从译学术语的发展中探求译学进步的轨迹,译海钩沉,探赜索隐。我对编撰思

想、编撰原则、编辑方针、编辑方法先后写了 10 余篇论文进行阐述。在海内外友人的帮助和指导下,花了五年时间,终于编撰出版《中国译学大辞典》。

本书分六个部分,包括:一、语言研究;二、多学科翻译研究;三、一般译论研究;四、应用翻译研究;五、术语·辞典·翻译教学;六、书评·序言·其他。每一部分论文以发表的年月为序。“语言研究”部分大多成文于 20 世纪 80 年代。“多学科翻译研究”以 90 年代的论文为主。“一般译论研究”涉猎广泛,最初只针对科技翻译,后来上升到应用翻译层面,包括宏一中一微三位一体的研究。“术语·辞典·翻译教学”集中了新世纪以来所发的文章。最后“书评·序言·其他”包括翻译史、期刊编辑等内容。

文集的各篇文章按原发书刊排版,改正了个别文字差错,参考文献作了基本统一的标识。为了尊重学术进步,文章内容未作更改。对于相同的论题,后发文章的观点可能对前论略有修正或有不同表述,则以后发的为准。

感谢何刚强教授和鼓励、傅敬民教授的策划和刘金龙副教授的宝贵意见。

特别感谢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庄智象社长对本书提出总体框架和设想,并安排精悍力量编辑出版本书。

方梦之于 2013 岁末

1935年春，我生于浙东农村。缺医少药，哥哥幼年夭折。母亲忙于劳作，疏于照料，妹妹窒息于襁褓之中。1942年，到了我读书的年龄，在上海谋生的父亲小有所成，花了20元大洋，雇人把我们母子俩带离家乡。一路上乘乌篷、过早海（沼泽地）、躲战乱、坐火车，晓行夜宿，历尽艰难；从曹娥江边出发，过钱塘江，到黄浦江畔，现在不过四小时的车程，竟花了一个星期。

父亲经营着一间自行车行，店堂楼上住着合伙人一家，我家住三层阁。我入读近在咫尺的弄堂小学。住宅改建的教室显得狭小、拥挤，但布置得很温馨，墙上挂着励志的条幅，如“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学而优则仕”、“学而时习之”等，至今仍有印象。弄堂就是操场，是小伙伴们课余玩小洋皮球、踢毽子、跳绳的场所。

1944年，到了三年级，可能与附近的一个日本宪兵营有关，我们开始学日文。记得整堂课都枯燥无味地念“啊依乌爱噢，卡基吡吡托……”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一年下来，只会背五十音图。好在次年日本投降，四年级的外语课改学英语。

到了五年级，父亲与两位合伙人分权析股，独立经营一家自行车零件厂。工厂设在弄堂内，一排三间，底楼机械车间，有车床、冲床、钳工工作台，二楼是装配和包装间，之上是工人们安身的低矮阁楼。我们一家住的是挑高的三层阁。这是一个工厂区，有轧钉厂、铸造厂、电镀厂、玩具厂等，昼夜机声隆隆、人声鼎沸。父亲工厂里不少工人来自农村，与我沾亲带故，我生活在他们之间感到很自在，有时爬上阁楼，跟他们一起听故事、猜谜语、唱越剧。

父亲严于律己，严于管教。但凡有小伙伴上门告状，我总挨训。要是我申辩几句，他会说：“一只碗不响，两只碗叮当。”久而久之，我与人无争，与世无争，只求安然相处，因而从小养成性格上懦弱的一面。

1948年，我小学毕业。在怡和洋行谋职的表哥（比我大十几岁）见我家周围环境嘈杂，提出让我中学住读，于是我考入了澄衷中学。对于在狭隘的弄堂小学求学6年的我，澄衷校园之大，如入无人空漠之境。一天晚上，我在校园中与同学追逐嬉闹，灯光昏暗，竟无视园中障碍，径直狂奔，皮肉之躯与石凳相撞，顿时血流如注，急送医院，腿部至今留下分币大的一块疤痕。

学校一般只允许星期六下午离校。每次回家，父母会给我零用钱。记得我第一次自主购买的三本书是郭沫若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少年机电工程师》。至今我还珍藏着这三本当时都看不太明白的书。对知识的自觉渴求随青春期的到来而涌动。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同年10月,上海组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现共产主义青年团)。在一位高二同学的启发下,我成为第一批团员,是当时班上的唯一。在党团组织的教育下,我积极参加学生工作和各项政治运动。1950年10月抗美援朝的炮声打响,不久,国家号召青年学生参加军事干校。我瞒着家里报了名,且体检和政审都合格。母亲知道后,颤巍巍地拖着裹过的脚板打老远赶到学校,找校长哀求说:“孩子还小,才15岁,等他长大一点再送他参军。”母夺子志,令我郁闷。若干年后我才体悟到,一个相夫教子、目不识丁、不善言语的家庭妇女,到庄严的学府求助于人,需要多么大的勇气。避免这次转折,对出生不好的我来说未必是件坏事。

父亲只读过三四年私塾,勉强能看报,但对子女的教育抱有较高的期望。解放后,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50年首次发行《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三大名著,他在报上看到广告后立即征订。前两种一直由我持有,后一种当时就被工人师傅“借”走了。精读名著提升了我的文字表达力和对社会百态的洞察力。初中阶段,每逢寒暑假,父亲要我每天清晨在表哥上班之前到他家补习英文,坚持下来,有所长进。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思想的进步往往导致家庭情感的隔阂。我想早日进入社会自食其力。于是,1951年秋考入享受人民助学金的高级职业学校。当时的中专今非昔比,报名者趋之若鹜,我的同学中有读过一年高中的。学校与我家距离很近(仅两街之隔,步行不过10分钟),但是情感上与家庭的距离较大,我习惯于住校,课余更愿与同学分享快乐,参加集体活动。中专期间,我读书欲更强,并开始独立钻研数学问题(投稿未果)。毕业时在服从分配的前提下,表达了继续深造的愿望。

1954年秋,我如愿以偿,以调干待遇被分配到大连外专俄语系(后并入辽宁师大),兼学德语。我在校负责学生会宣传工作,每周出黑板报(校报),组稿、审稿、改稿、编排等成为我课余生活的一部分,我的编辑生涯由此发轫。两年后,我留校入助教进修班继续学习。大学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阶梯,我不仅收获了知识和技能,还收获了爱情。

离开外语院校时,时代的风暴即将来临,“大跃进”的号角快要吹响。我被分配到一家棉纺厂,面对杂草丛生的一片荒地,开始在一位从未接触过冶炼技术的老工程师的指导下筹建炼铁车间。那时,为响应毛泽东主席的“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个东西,就什么都好办了”的教导,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如火如荼,波澜壮阔。我对我国钢的年产量在短时期内赶超英国1070万吨的目标满怀信心,并立志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而奋斗。干中学、学中干。边设计、边采购、边加工、边施工、边安装……经过三四个月的奋战,红彤彤的铁水奔流而下。由于建设周期短,出铁快,区里要我们准备材料做介绍。我一面整理材料,一面突发异想:与其单一介绍

局部经验,还不如汇总我两三个月实地考察所得,把我对炼铁技术的初步认识加以系统化、条理化。此举正遂出版社的心意。在这“火红的年代”,总共只花了不足100天的时间,手写的文字就变成了铅字,我的处女作《土法炼铁》于同年10月正式“出炉”。

仅仅过了一年多,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耗损大量资源的土法炼铁很快失去了昔日的辉煌。世态多变,人生多舛。土高炉熄火之日,正是我茫然之时。我跌入人生的低谷,开始到矿山劳动,烧大炉,当办事员,任夜校教师。时处三年自然灾害,生活的磨难可以承受,现实与理想的巨大落差令人惆怅,好在希望和憧憬还在,信心与毅力尚存。外语毕竟是我的专业,我坚持业余学外语、搞翻译。我1959年和1960年先后出版译作《双座自行车》(合译,人民体育出版社)和《船舶蒸汽锅炉的自动控制》(人民交通出版社),1961—1963年间我为《机械文摘·动力分册(第八分册)》(月刊)译校文摘,每月一两万字。

1963年,我国经济上开始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次年,我放弃按政策调入上海与家庭团聚的机会,从矿山调入江苏冶金研究所情报室任专职翻译。我从小学习不偏科,爱思考,曾幻想当文理兼容的科幻作家。搞科技情报应是我理想的职业。在研究所,新的项目一个接一个,我满怀激情地迎接工作中的新的挑战,知识积累层层提高,并运用多个外语语种作课题检索和翻译。

正当我工作渐入佳境,1966年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批判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批斗省局领导的呐喊声一浪高过一浪,群情激愤,声势浩大。各级政权机构轰然倒下。我研究所的各科室都成立了战斗队,我被推选为情报资料室战斗队队长。各战斗队队长组成的“联席会议”取代了所里原党政班子。我不由自主地卷入了研究所运动的漩涡中心。

1967年春节回家,历来都以亲切笑脸相迎的家人,那日却以诧异的目光,打量着我左手臂上的红袖章。坐定后他们告诉我,不久前父亲厂里佩戴同样红袖章的造反派穷凶极恶地来抄过家。因而他们对红袖章刮目相看,警惕三分,想不到自己家里也冒出一个。在上海工业大学任教的爱人劝我收敛锋芒,谨慎做人,想着家庭,想着自身。在“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的血统论盛行的时代,在集体无意识的狂热中,爱人的一席话让我如服一贴清凉剂,顿时冷静下来。于是,我退出“联席会议”,把握洁身自好、独善其身的生活节律,明哲保身为上。

所里科研工作全面停顿,除了“雷打不动”天天读毛主席著作,整日无所事事。有人沉迷于打牌、聊天、织毛衣。我除了看点闲书外,跟着室友敲煤油炉,重拾年少时把玩矿石机、装一灯管收音机的乐趣,学装半导体和集成电路(当时市上半导体收音机紧缺)。逢到上海出差,做小家具、修理沙发椅,甚至裁服装,干点既有益身心健康,且省钱又实用的活。

读书欲激发写作欲。1969年夏,举国批判苏联修正主义。我从英文和俄文的

杂志上看到一些报道，反映当时苏联科研机构的转型及变化。我摘译了一些例子，根据当时的观点，写了一篇题为《苏修科学技术的衰落》的长篇文章，投到《人民日报》国际版，文章以“命题+观点+例子”的方式展开。不料，过了10天，《人民日报》国际部负责人来所亲临“指导”，说稿子拟用，但立论要拔高，实例可减少，批判需加强，提出要按两报一刊（当时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口径改写。对此，革委会领导不敢怠慢，立即派了两位政治觉悟高的同事协助我摘抄报刊资料和那时常用的政治套话。修改稿按既定调子完成，只觉文字干瘪，内容枯燥，其后果果然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有两三年情报资料室几临关门。人员各奔东西：有下放农村的，有调离的，有参加专案组的，我则去筹建单晶硅实验室，包括学习制氢技术，学习拉单晶以及采购设备等。这是一项高技术、高回报、投资大、技术要求高的科研项目和工程，非我等外行短期内可掌握，最后无果而终。

1975年初，我受命参加第35届广州春季交易会的项目，担任序馆“自力更生办好小钢铁——江苏省丹阳县钢铁厂”宣传版面、图册和展品名录的翻译。“文革”期间，广交会是我国对外政治宣传的重要窗口之一。展示我国政策性成果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翻译时我战战兢兢，生怕出错。交易会突出政治，这类内容都布置在醒目位置，但参观者大多投以短促目光，绕过模型和展品，匆匆而过。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通过革委会找到我，让我编撰《金属材料实用手册》（该书多次重印）“进口钢材”部分。书中只列编写者单位名称，不具个人名，没稿费，只发给编者一本《新华词典》、一本笔记本和两支原子笔，以资纪念。这是当时出版社通行的做法。

1976年，打倒“四人帮”，经过十年禁锢的人们学习外语的热情空前。我报名到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业余学习日语，每周三次骑车到大教室上课，去晚了只能站在走廊上站着听课。如此单来独往，风雨无阻，经过一年半的学习，日语终于成为我的又一工作语言，后来也译校过一些专业文献。对于文献工作者而言，外语只是必要的工具，多一种工具，多一条情报来源。

“文革”后期，情报资料室的工作恢复正常。我的工作包括：1. 围绕重要科研项目做“定题服务”；2. 编写内部不定期活页“矿冶动态”——报道先进国家的科技政策、技术指标，介绍新技术、新产品、新材料、新设备，登载省内有关企业的重大成果等；3. 主编以技术论文为主的综合性矿冶学术期刊（季刊，后公开发行）。

我在南京的14年，“文革”占了大半。其间，大批判、大串联此起彼伏，政治学习天天有，科研工作时断时续。领导干部先打倒后扶起，员工下放了又上调。工作拖沓，纪律松弛，人心浮动，目标迷茫。年轻人常聚在一起弈棋打牌，消磨时光。“志士惜年，贤人惜日，圣人惜时”，我做不到像圣贤那样爱惜时日，但尚属有志之士，想到自己年过而立，事业无成，经年累月，虚度时光，有所不忍。特别是我家庭

分居两地,想到父母和爱人为小家庭的付出,无以为报,黯然悲切。好在有书为伴,心灵得以慰藉。南京夏日炎炎,晚间,同事们在楼下纳凉聊天,我独自挑灯夜读,汗流浹背。为防蚊子叮咬,足登高帮胶鞋,身穿短裤衩,赤膊上阵。我一手按书翻书,一手摇着蒲扇。时而用蒲扇从脸上刮汗;时而拍击腿关节裸露处驱赶蚊子。到了冬天,因为冷,下半身钻在被窝里,床头灯下读书到深夜……日子清苦,寄希望于未来。

1978年底,我离开了为之耕耘14年的翻译园地,调入当时的上海工业大学(现上海大学),踏上了陌生的教学岗位。搞翻译,特别是应用翻译,纯粹把外语当工具,能够在专业知识的协同作用下充分传达原文的信息即可。所以,搞技术情报翻译的,多掌握一门外语,就多一条猎取信息的路径。而当教师,传道、授业、解惑,给人一杯水,需要一桶水。教英语,需要研究英语,力求对它有精深的理解。初上讲台,我诚惶诚恐。与同龄教师的差距是没有教学经验,但勤能补拙。我不敢懈怠,全身心地投入。我的第一个意念是:在短时期内站稳三尺讲台。我开始教大学英语,除了认真备课,搞好课堂教学之外,还开辟第二课堂,找一些适当程度的原版读物供学生选读,找录音带供他们选听。指导学生学习方法,并抽出时间辅导。三四年后,我开始上翻译课。任何一门课程都有它的理论基础,以实践为主的翻译课也不例外。教育者必先受教育。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西方语言学翻译理论系统地引进,奈达、纽马克为我打开观察译学殿堂的一扇窗户,我开始初步领悟到翻译的真谛。

实践证明,在非外语环境中外语,学生总是本能地用母语与外语对比。不管是正确的或是不正确的翻译,在大多数情况下,译文是对比或比附的产物,翻译课的目的是让学生认识两种不同语言的异同,把不自觉的、错误的对比转化为自觉的、正确的对比。掌握一般的翻译理论和懂得语言对比的规律只是从科学的角度帮助译者了解翻译的实质与原则,开启正确的翻译思路,而真正要搞好翻译,还有赖于潜心实践,勤学苦练,注意翻译方法,讲究翻译技巧。英汉翻译课是继承和传授前人已经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为其主要内容的。因此我是从语言对比和翻译技巧的微观层面进入翻译理论研究的。

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我国书市上科技英语语法、科技英语词汇以及各种科技英语读本琳琅满目,一些研讨会言必称科技英语,有人执意要把科技英语作为“独立学科”进行研究,不少理工科院校还相继成立了科技英语系(至今仍有保留的),当时外语界有人把科技英语的学习和研究提高到不适当的地位。但英语语法就是英语语法,不存在独立的科技英语语法。要深入研究科技翻译,必须找到合适的切入点。我受王佐良先生的文体学思想的影响,选择从文体学角度切入。80年代中期,我着手思考首部专著《科技英语实用文体》的写作。该书于1985年动笔,写作过程中也曾因缺乏材料积累而为难,于是就写信给原研究所的同事,请求协助